

专 论

形象学研究要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

孟 华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北京 100871)

摘要: 欧洲当代学者在理论与方法论上对传统形象学研究进行了革新,将形象学推进到前所未有的体系化阶段。但革新并不应意味着彻底抛弃传统,而应是对传统的创造性发展与继承。因此,形象学研究应在处理传统和革新的关系中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在这方面,中国“执两用中”的中庸思想或可提供某种哲学的帮助。此外,形象学的跨学科性也要求注重研究的总体性与综合性。本文建议引入“形象场”的概念,以帮助研究者建立总体、综合的意识,更好地把握形象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 形象学研究; 形象场

Abstract: European scholars have pushed the Study of Image to a new stage. There are things new in their studies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ey are deserting the tradition. Actually recent advancements on the Study of Image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traditions, therefore, the Study of Image should be dealt with synthetically as a whole.

Key words: the study of image; image groups

自90年代以来,当代形象学被陆续介绍到我国,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与关注。但在某些人的理念中,这似乎是一个完全有别于传统的、崭新的研究领域。

此论实大谬也！

实际上，形象学的研究史可以远溯至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众所周知，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旅游者”，把他们作为“媒介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而“旅游者”们流传下来的游记则普遍记录了异国的“形象”，这就使对形象的研究包含在了最传统的“国际文学交流”^①的研究中。后来，当卡雷提醒人们重视研究“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②时，他其实是把原来隐含的层面凸显了出来，以便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一个较具操作性的切入点，去逼近那些难以捕捉的“影响”；而当基亚进一步把“人们眼中看到的异国”单辟一章纳入到《比较文学》教材中去时，他也仍然是把形象研究作为文学交流的一个分支来讨论的。^③这些学者都充分意识到了“异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民族对异国文化的看法，折射出了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影响、诠释的情况。正是为了使传统的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更具可操作性、更深入，他们才大力倡导、开拓形象研究这一层面。

到了当代，形象研究在新形势下借用了诸多新理论、新方法，对传统进行了重大改革，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建构起了一套较成型的体系，终于可以被冠之以“学”了。但它研究的终极目标并未改变：对一国中异国形象的研究，最终导致的始终是对“我”与“他者”间文学、文化关系的关注，因而它仍然隶属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大范畴，使用的也主要是影响—接受研究的方法，完全可以用“X与Y”模式来涵盖。^④

毋庸置疑，当代形象学对所使用的理论与方法论的革新，为形象研究注入了一股活水，保证了传统研究得以生生不息地发展。但倘若说这些革新是顺应西方的潮流而生，符合西方思想发展的脉络，那么它在中国是否适用？中国学者又能在形象学所使用的

理论与方法论方面做出那些贡献？本文试图就我个人在授课、研究及指导学生的实践中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做一初步的总结。而其中所涉的所有问题都是以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的革新与继承为出发点的。

一、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的革新与继承^⑤

1、注重“我”与“他者”的互动性

当代比较学者对“我”与“他者”互动性的关注，凸显在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对“他者形象”的下述定义中：“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⑥巴柔显然受到了本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发展的影响，而他尤其强调语言学家们，特别是本弗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 1902—1976)对他的启示。

符号学创始者索绪尔认为：能指与所指间没有固定的天然联系，语言中一切成分被联系起来，是由“差别”和“对立”来决定的。这一思想后来在本弗尼斯特那里得到了发展。他在《一般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提出：代词“我”或“你”，既不代表一种概念，也不代表一个人。个体的“我”只有在一具体的话语语境中才能被鉴定出来。总之，A 只有与非 A 联在一起时才能成立，才有意义。^⑦形象学由此受到启发；若将形象制作者称为 A，他者称为非 A，前者只有和后者组成一对关系后才有意义，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的，更是互补和互为参照的。于是，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被放在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进行研究。事实上，对异国人形象的研究从根本上讲就是对主体—他者对应关系及其各种变化形式的研

究,把这对关系扩大到极至,甚至可以涵盖一部西方哲学史。^⑧

2、注重对“主体”的研究

当然,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当代学者尤其偏重于形象创造主体的作用,认为“他者”形象投射出了形象塑造者自身的影子,是后者空间的补充和延长,因而形象这种语言主要言说的就是“自我”。^⑨

注重“主体”可以说是当代形象学对传统所作的最重大变革。它意味着研究方向的根本转变:从原来注重研究被注视者一方,转而研究注视者一方(即形象塑造者一方)。这里明显可见的是接受美学的影响: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表现出该国对异国文化的阅读和接受,而注重研究形象塑造者一方,也就等于注重研究阅读和接受者一方。这便是当代形象学利用接受美学对自身方法论所作的完善和修正。

这种对“主体”的注重,同样也是与20世纪西方思想的发展一脉相承的。追寻着西方思想发展的轨迹,当代形象学在利科定义的想象的客体轴上,^⑩明显倾向于萨特的理论。观念的转变带来了研究重心的转变:既然认为想象是创造式的,而非再现式的,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按照传统的方式继续研究形象与现实存在间的真伪程度了,于是,研究的重点便转移到了形象的塑造者——想象主体一方。至于对变化多端的想象主体,利科给出了另一条主体轴,并以主体对现实批判意识的强弱为标准定位了轴的两端。当代形象学对主体轴的借用,紧密地与社会集体想象相联系。两者的关系或可这样概述:欲知主体的批判意识如何,先需弄清主体生活于其中的彼时的社会现实。而对形象学而言,所谓“现实”主要是指时人对某一异国的集体想象。一个作家(读者)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想象密不可分。只有搞清了集体想象是怎样的,方能识别出生活于此一语境中的作者究竟

是复制了集体描述(处于利科主体轴“批判意识为零”的一端),还是对其进行了批判(处于“批判意识强烈”的一端)。^①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了当代形象学的另一个特点——注重总体分析。

3、注重文本内部研究

在论及总体分析之前,先来看看当代形象学对传统所做的另一重大变革——注重文本内部研究。文本内部研究是形象研究的基础,它要回答的是形象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即一部作品中的“异国形象是怎样的”?

传统研究也处理文本,然而使用的方法却截然不同。传统的方法主要是描述性的,满足于对文本中的异国形象做或粗或细的勾勒或介绍;而现在则主要使用结构主义方法,并充分利用了符号学。^②此外,文本内部研究在整体研究中所占的比重也大大增加,研究者需要在词语、结构单位、故事情节等各个层次上对文本自身进行条分缕析的研究。

但在进行文本内部研究时务必注意形象多样性的问题。既然形象是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③而情感和思想是世间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东西,因此就难以用固定的模式来套用。如果把符号学、结构主义的方式推向极至,把一切都视为“程序化”、“编码”了的东西,处心积虑寻找各种解码的规律,就会因此而忽视了一个形象最动人的部分。而忽视了形象所包含的情感因素和每个作家的独创性,也就不啻扼杀了形象的生命。为了使形象学研究避免陷入教条和僵化境地中去的危险,就不能孤立、封闭地进行文本内部研究。

巴柔教授提出的一个建议或可避免此类窘况的出现。他认为,索绪尔仅把词语作为由一个能指与一个所指组成的一个符号,而忽视了词的创造力,忽视了词也具有无限扩张的可能。而德国

语言学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5—1835)提出的语言诗学则认为在文本中一个词与其他词的配合不同(并置、空间化、重叠),处于不同的上下文间,就会产生出不同的效果。巴柔因此建议借鉴洪堡的理论,把词不是看作一个意义产品,而是看作一个具有无限可扩张性、具有能量的概念,^⑭关注词语在不同组合中的不同效果,关注词语选择的条件与运作。

这样,人们在进行文本内部研究的同时,就需重视文本与外部语境相互铰接的情况,这是打破封闭式研究的更重要的方法。

注重文本内部研究堪称是对传统所做的彻底“改造”之一,这是当代学者对反对派意见进行了深刻反省的结果。但这种改造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强调内外结合的重要,并在文本内部研究之中就纳入外部研究的内容,仍是对传统的一种批判的继承。

4、注重总体分析

在现实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或借助其他传媒间接接受异国形象的。即使有些人有亲赴异国的经验,通过直接接触去感知异国,他们也是社会中之人,与其生长、生活于其中的本土的社会、历史语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一个人踏上异国国土时,潜意识里早已被灌输进了本土文化对该国的诸多“先入之见”,多多少少自觉不自觉地都会以此为“公理”来注视、读解、描述异国。事实上,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对脱离集体无意识的樊笼,无论他有多么强烈的批判意识。

正因为文本所包含和传播的形象与历史、社会、文化语境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形象研究就不能使阅读简单化,就一定要从文本中走出来,要注重对创造了一个形象的文化体系的研究,特别要注重研究全社会对某一异国的集体阐释,即“社会集体想象物”。

“社会集体想象物”这一重要概念是从法国年鉴史学派那里借用来的,但形象学只研究其特殊的一种表现:对他者的描述。^⑮对社会集体想象物的研究,代表了形象学的历史研究层面,它不属于文学内部研究,而属于文学社会学,尤其是社会符号学的研究范畴。此即当代形象学在定义形象时一再强调文化层面的原因。因此,上文引用的巴柔对形象的定义完全可以做逆向反推式的表述,即:研究文学形象,必须研究一个民族对异国看法的总和(即由感知、阅读,加上想象而得到的有关异国和异国人体貌特征及一切人种学、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个层面的看法总和,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研究这种看法是如何文学化,同时又是如何社会化的。

如果说注重“我”与“他者”的互动性、注重对主体的研究、注重文本内部研究以对传统的革新为主,那么重视总体研究则以对传统的继承为主。当代学者们始终牢记“文学是社会的表现”,强调文学与产生它的外部世界有着无法割断的渊源关系。但这种强调又与传统不尽相同:学者们不再把文学作品作为社会学研究的“证据”,而是绕经社会、历史来研究文学,目的在于更好地阐释文学形象,把握其内在逻辑。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也就把文学作品置放在了一个更广阔的研究视阈中。这样一种带有改造和发展意义的继承,再与以上各个革新层面联系在一起,就明显超越了传统,成为一种创造性的继承。

以上,我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的革新,并试图在论述中凸现出革新与传统的因袭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建立在个人阅读、研究基础上的分析,尽管基本内容都见诸欧洲学者的论述之中,却是一个中国比较学者的“再写作”,阐释的是一个中国人对当代形象学的理解,内中必定有诸多误读。不过,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读解,才引出下文中我对形象学研究要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的思考。

二、形象学研究要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

1、注重研究的总体性与综合性,反对片面化与极端化的倾向
提出形象学研究要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首先是基于对当代学者某些“非此即彼”的论述的不满。传统的研究确实有许多弊端,但我们在上面已清楚地看到,一个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事物,一定带着某些传统的印痕。而这些传统因素之所以得以保留,是因为它们本来就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不仅能够流传,而且还为革新提供了基础和依托,并在革新中被现实化了。但当代学者在某些问题上似乎忽视了传统的这一传承性。

例如在讨论“注重对主体的研究”时,莫哈多次强调:研究形象的真正关键在于揭示其内在的“逻辑”,而非核实它是否与现实相符。^⑩这种提法与以往注重参考系的错误倾向针锋相对,显然具有纠偏的作用。但“矫枉过正”的做法对已经成熟的比较文学研究并无多大裨益。客观地讲,传统研究的内容今天依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倘若不了解作为参考系的现实是怎样的,研究者又如何来判定形象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创造性想象”?而没有这种鉴别,把握形象的内在逻辑岂非一句空话?

与此相关联,当代学者对形象的语言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持论偏颇,他们过于强调形象“言说自我”的功能。^⑪而研究实践却告诉我们,形象“言说他者”的功能亦不容忽视。欧洲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游记,难道没有记录下北美、中国等非基督教民族作为他者的客观存在?从谢阁兰那些以中国为主题的诗歌、小说中,欧洲人就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中国特殊的“他者”美的信息?中国早期描写西方人形象的作品,多为笔记、日记等副文学作品和那些虽冠之以“史书”之名,却也仍然具有某种文学性质的

作品。由于并非纯粹的虚构，这些作品中参考系的地位就尤为突出。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对这一点进行过探讨，并总结道：“在这样一些书写中，想象与叙事杂陈，所构成的异国形象尽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且确实按照先存于形象的注视者文化的模式、程序被重新组合和书写，但作者们想要记录亲见‘事实’的努力也仍是清晰可辨的。正是有赖于这种努力，中国才开始‘睁眼看世界’，它导致了相异性的传入，渐渐改变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并且在与他者的相互关照中也渐渐地改变了他们对自我的认识。……我们因此感到，异国形象在‘言说他者’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实际上，言说自我与言说他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互动的机制：当对他者的言说累积到一定量时，就会产生一种反作用，使传统的文化模式、程序发生改变。”¹⁸因此，较公允的结论或许应该是：形象同时具有“言说他者”与“言说自我”这两种功能，而两者间的关系又十分复杂。尽管往往以后者为主，但也不排斥前者占主导地位的情况。这一方面与文类有密切的关联，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作者对相异性的态度。但无论如何，“言说自我、言说他者”这两种功能都会共存于同一个文本中，很少有一方完全为零的情况。

在一种强烈的反传统意识的支配下，出现某些为纠偏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将一切事物都视作绝对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却在根本上与以“打通”为己任，以“开放”为灵魂的比较文学的精神背道而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比较学者或许能对当代形象学有所贡献。中国传统的“执两用中”的中庸哲学，主张“过犹不及”、“和而不同”，即兼容两端中的合理因素。以这样的思想为指导，也就是主张既不因循守旧，也不对传统做全盘否定，在一种整体、综合的视野中，适度把握两者的关系。¹⁹而是否具有这种意识，将直接关系到形象学研究的学术价值。

2、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是跨学科研究的苛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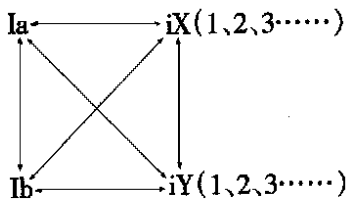
与上述内容不同,这一点是当代学者所反复强调的,因为他们都十分重视形象学的跨学科性。

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因而就使形象学在两个层面上都大大超出了文学本来意义上的范畴。从传统的意义而言,对一个异国形象的研究势必要涉及到“人学”的全部内容:从异国人的长相、肤色、体态这些人种学特征,到服饰、饮食、习俗,再到政治、制度、观念……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异国形象的有机组成成分,因而也无一不在研究者的视阈中。无论是对其中的部分内容,亦或对整体进行研究,研究者都需在文学与人种学、文化人类学、史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相交汇处做综合性的考察。当代形象学又提出要注重对想象主体的研究,自觉肩负起了对“想象、描写其他民族的民族进行总体的思考和研究”的责任,^⑩这就把“人学”研究同样也运用到了形象塑造者一方。如果说传统的研究并没有把跨学科性作为这一领域自觉的追求,那么,当代形象学则理直气壮地宣称:它的最大特质就是跨学科性,跨界是其必然的逻辑。

此外,形象研究又涉及到许多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往往彼此作用,对这些关系互动机制的准确把握也要求研究者必须注意总体性与综合性。

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最主要的一对是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当代学者在许多论文中对此都有详论,此处不再赘述。惟一需要补充的是,他们都没有强调两者间的关系往往呈现为互动的,即是说:一部具体作品中的异国形象既有受制于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面,反过来也或多或少都作用于后者。当然,这里有历时与共时两种情况,倘若以 I_a 代传统(历时)的社会集体想象, I_b 代现实(共时)的社会集体想象, i_X 代历史上(1、2、3……中任意)一部具体作品中的异国形象, i_Y 代现实中一部作品(1、2、3……中的任意

一部,且与 iX 的 1、2、3……可有单独或整体的关系)中的异国形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或可以下图标示:



请注意:在此示意图中,每一组关系都是双向的。如果再把每一部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铰接方式考虑在内,情况就更复杂得多,它必然会涉及到作者、作品、读者或其他受众、各种现实语境、民族传统、心态等方方面面,而它们之间的组合又呈犬牙交错的形态。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研究者只有在关注每一个因素、每一对关系的基础上,以总体、综合的意识与方法,将研究结果加以整合,方能取得较好的结果。

3、注重研究的总体性与综合性,是受到“场论”的启发

“场论”的概念是从物理学中借鉴来的,原是指称用来研究各种物理场的运动规律及其相互作用(如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中受到电磁力的作用,物体在引力场中受到万有引力的作用等等)的理论。

20世纪30年代,美籍德裔学者勒温(K. Lewin, 1890—1947)首先将“场论”运用到心理学领域中,^②用拓扑学和物理学的概念(场、力、区域、边界、向量等)描述人在周围环境中的行为。而自80年代起,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又将这一理论转用到社会学中,认为在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相互作用“场”,从而提出了语言场、文学场、艺术场等概念。

在他看来,文学“场就是在各种位置间的一个(控制或服从,补充或对立等等的)客观关系网”,各种与文学有关的存在,如文类、杂志、沙龙等,都在这个场中占据位置。每一个位置都由它与其他位置的客观关系所决定,都受制于它们目前和潜在的在场的结构中的情形。^②如同物理场一样,文学场也在时间中发生位移,而位移则引起变化。此外,文学场又是与权力、政治、经济、文化场相叠加或相交汇的,场与场之间也存在着各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其中尤以权力场的作用为最大。^③

受到这个“场论”的启发,我认为也可将我们所研究的异国形象视作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粒子,那么,形象也就处于一个“形象场”内;而上文设定的 Ia、Ib、iX 就都可被视作在场中占据了某个位置的占有者;至于与形象的制作、生产、复制、消费有关的各种外部的、社会的因素,如动力线、各种语境等,则构成了与形象场相交并相互起作用的其他各种场。

如果说布尔迪厄的“权力场”中心说完全符合偏重形象塑造主体那类研究的需要,那么,注重总体性、综合性的研究就要求同样也要重视一国对异国认知的“知识场”。^④实际上,无论我们如何重视主体,都无法否认形象(或社会集体想象物)与塑造了它的作家(或群体)对异国认知的水平直接关联,而凡是涉及到知识的问题就总是具有因袭力和传承性的: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在历史上对异国的认知当中,总会有一部分内容流传下来,进入到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中。这种积淀下来的因素在知识场中占据一个相应的位置,并通过各种关系网、各种相互作用而对一个具体作者施加影响,使其自觉不自觉地、部分或全部地接受这种对异国的社会集体想象。但集体想象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的某些“先入之见”在适当的现实外力作用下(如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比的变化)将会发生变异,产生出与传统集体想象既联系,又有别的

另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来。新的想象物又会继续影响同时代和(或)下一代的作者……在这个历史演变的长河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得以流传的集体想象都是将对异国的复杂认知简单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认知总体中,集体记忆只留住那些与各种语境、与先在期待(包括想象)相契合的因素,并加以曲解和漫画化,同时赋予了它一层象征意义。譬如“洋鬼子”的形象,就是从中国人对早期来华的欧洲人的认知总体中,取其人种学及性格中最刺激国人的特征,加以简单化、漫画化、象征化的结果。这种象征化操作需要的时间有长有短,在历史发生突变时可能周期很短,而在相对平静的年代中,则需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之所以要在形象学中引入和强调这个“场”的概念,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形象成型的复杂性:一个形象要受到“场”中上下左右、纵横交错的关系的制约,要受到与之相交的其他场中各种力的作用,而场自身在时间中的位移也要引发出各种变化。总之,在如此编织起来的关系网中,所有的因素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这就要求人们在研究时必须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换句话说,就是要求研究者重建一个“形象场”以及与之相互作用的各种场(特别是一个足够宽泛的对异国认知的“知识场”),以期较准确地把握住“形象”或“社会集体想象”的成因、形态及其潜在的能量。

以下试举两例予以说明。

三、注意总体性与综合性二三例

例一、关于对《“洋鬼子”词源初探》一文的质疑²⁵

这篇论文的材料搜集、思考、研究和成文历时约五六年之久,期间研究视阈不断拓展,各种“场”不断被牵连进来,呈滚动交叉连

接状。早在写作《试论套话的时间性》^②法文稿时，我就发现鸦片战争时期的文学文本中反复出现了“洋鬼子”一词。这刺激了我的兴趣，遂有意识地进行了文本搜集。但文学文本的累积只能明证该词已成为一个套话，却无法回答“为什么”的问题，研究便随之进入到历史场中。研读史书的结果是将“鬼”的起源逆向追溯到了16世纪葡萄牙商人的初次来华，同时使我惊讶地发现：正史、野史竟然使用的是同样的材料，而雷同的诠释更证实了官方、民间存在着某种“思维定势”。于是研究再一次跨界，涉及到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思想史、心态史^③等层面。1997年，在莱顿第15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我首次发表了题为《“洋鬼子”词源考》（法文）的论文，对“洋鬼子”套话形成的史前史做了考证与分析，认为该词的内涵主要是轻蔑、惧怕、憎恨等。^④但不久我就读到了清代的另外两部笔记，内中对“番鬼”的描写不仅十分客观，而且明显透着善意。这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原有的结论，并进而研究动力线的作用。我将思考的结果写了一篇补正文章，以《清人笔记中“鬼子”形象辨析》（法文）为题在1999年日本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宣读。同年8月，我将两稿内容综合，又做了一些修正和补充后写成中文，在成都会议上宣读。此文的分析及论证远较1997年的法文稿全面、深入，但在发表时仍受到了一些质疑。批评者指出：文中对从“番鬼”向“洋鬼子”的语词转化欠缺分析。这一批评十分中肯，切中要害：表面上看，“番”与“洋”似乎只有一字之差，实则却牵涉到很内在、深刻的问题，它要求研究者将两字的转换置放到中国语言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来做深入探讨，而语言现代化又必然会牵连出一整套与现代化相关的其他文化、政治问题。如是，只有重构语言场，并深究语言场与知识场及其他各场的相互作用，这篇论文才有可能有新的突破，较到位地完成预期的研究目标。

例二、关于《中国人自画像》一书中形象的性质问题

陈季同(1851—1907)是晚清派驻欧洲的一名外交官,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20世纪初的中欧(特别是中法)文化交流舞台上十分活跃,起到了双向传播媒介的作用。他的文化交流活动很有特色,相关的思想、主张又相当具有前瞻性,颇值得研究。国内史学界已有人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并将署名陈季同的《中国人自画像》一书译成中文。^②译者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该书首次面对欧洲读者,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出发,对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中西文化发表看法,从而开启了中国人独立从事此种文化交流活动的先河……”,^③并进而提到,辜鸿铭、林语堂在这方面都只是步陈季同的后尘而已。

这些评价显然都建立在陈季同确为《中国人自画像》一书作者的基础上。然而,此书的署名权在历史上却一直存有争议:法国人福果·德蒙迪雍(Foucault de Mondion, 1849—?)早在1890年就已声称他才是此书的著作者。^④这段公案本不该与形象学有涉,无奈,此书既是描写中国与中国人的,著者问题就直接涉及到了形象的性质问题:书中描绘的中国究竟属于“自塑形象”,^⑤还是由法国人描写的“他者形象”,亦或是中法作者合作而成的自塑与他者相混的形象?性质未定,遑论形象的内、外部研究?况且,这份“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还直接关系到对后人作品的评价:林语堂笔下的“自塑形象”是秉承了国人自我描述与想象的衣钵,还是接受了法国人基于“社会集体想象”而塑造的他者?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两者在形象学研究中固然都很有意义,都值得做深入探讨,但若性质不定,其他的研究也就都失却了用来定位的坐标。

然而,要想了结此段公案谈何容易!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研究者恐怕只能从“氛围”入手,先来重构代表了法国人当时对中国认知水平的“知识场”,再由此推论德蒙迪雍是否具有足够的

知识准备来撰写这样一部详论中国的作品。而 19 世纪 80—90 年代法国人的这一“知识场”，至少应包括以下诸方面：历史上法国人对中国的认知水平（早期来华旅游者、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18 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启蒙思想家塑造的中国形象等）；这些史实、情感与想象的混合物在时间位移中的承继与流变；第二帝国时期中法两国间实际的外交、政治、文化关系（这是政治、经济场与知识场相交的部分）及各种堪称“媒介”者的文化活动；汉学在 19 世纪的发展及所使用的法国社会科学派方法；中国文学、文化在法国的介绍、翻译、接受情况……等等。这些因素在场内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彼此作用。研究者只有重建起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网，方可获得对《中国人自画像》的著者做“大胆的假设”的权利。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没有这场笔墨官司，这一“知识场”的重建也是形象研究所无法绕开的。须知，一本论述中国的书能够在欧洲走俏，无论作者是谁，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都须满足欧洲人的阅读期待，都须与时人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有着某种契合（投合它和（或）以它可接受的力度丰富、改造它）。更何况此书直接以法文写作，以法国和欧洲人为预设读者。总之，重建这一知识场，是研究社会集体想象，并进而研究形象（重建形象场）的关键。

四、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的研究要求学者的小心态

上述例子充分说明，在形象研究中的任何一个课题，哪怕只涉及到一个词（套话）、一部作品，都要求研究者重构与之相关的各种场。这就对研究者的知识准备、研究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的关系网，研究者必须具有总体和综合的意识，运用总体、综合（即跨学科）的方法去处理。即是说，不能把形象与它所处的场、与作用于它的各种力割裂开来做孤立的研

究,而要研究形象或社会集体想象如何在各种力的总体、综合的作用下成型,它们如何文学化和社会化,两者如何相互作用与转变,并在时间中发生位移和嬗变。

而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的研究,首先就要求一种“小心态”。所谓小心态,是指一种求真的精神、一种严谨扎实的学风、一种开放的意识。具体而言,在选题时就是要量力而行,宁肯把题目定的小一点,从小处做起,扎扎实实地把问题做透,也不要以宏大而无法驾驭的题目来折腾自己、吓唬别人,搞出一些经不住时间考验的垃圾来;研究时则应具有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敢于否定自我、敢于质疑各种定论;同时,还应取一种开放的写作方式,即,论述和分析都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满、说死(因为在一个互相作用的场内,任何因素的些微变化,都会带来整个场,甚至数个场的变化)。对凡是存有疑虑、问题,仍需商榷之处,都应在行文中坦言,为自己今后的研究、为与别人的合作打开一个接口。

事实上,任何人的知识结构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因而也就很难满足对知识准备要求如此苛刻的研究。提倡“小心态”,也就是提倡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我在研究“洋鬼子”套话的生成时,就曾就教于夏晓虹和多个学生,他们或就字源、典籍给我指点,提供信息,或帮我查阅有关资料。^③而今后重构语言场的工作,肯定还需向语言学、语言史学的专家们请教。同时,“小心态”还意味着提倡协作精神。在这一点上,法国年鉴史学派代表人物费弗尔(Lucien Febvre, 1878—1956)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他在论述史学家应与心理学家携手合作时这样讲道:“……历史学家要向心理学家提供为建立有效的历史心理学所必须的材料……这项工作巨大的。它巨大到不仅超出某一个单独的人的力量和才能,而且超出一门单独的科学或两门科学的领域。为要做好这个工作,得假定应就建立一个各种联合之网进行协商。”^④

在这个意义上,“小心态”不仅是形象学研究所苛求的,它也适用于以“跨”为主要特质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一切领域。我一向认为,本学科研究的难度、对学者素质的高要求,决定了比较文学是一项集体的事业。每一个自称为比较学者的人都应取这种小心态,向各方圣贤(包括本学科各个领域及其他各个相关学科的专家)求教,与他们通力合作,才能真正地(而不是虚张声势地)占据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制高点。

注:

- ① “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在法文中最早称作“*échanges littéraires internationaux*”,直译即为“国际文学交流”。
- ② “*Avant-propos à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比较文学》序),载基亚《比较文学》,PUF,1951,p.6。
- ③ 参阅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大出版社1983。
- ④ 参阅孟华《为“X与Y”模式一辩》,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5月10日。
- ⑤ 这一部分内容最早是为陈、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一章而撰写的,这里又据1997年以来的研究和思考做了修改和补充。
- ⑥ 巴柔:《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孟华译,载《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4期,第79页。
- ⑦ 参阅 Beveniste,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Gallimard, 1966, T. 1, pp. 258—266。中译本已收入“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 ⑧ 参阅莫哈“*Imagologie littéraire et mythocritique*”(从文学形象学到神话批评),载布吕奈尔主编 *Mythes et littérature*(神话与文学),P. U. P. S., 1995, p. 130。
- ⑨ 参阅巴柔“*De l’imagerie culturelle à l’imaginaire*”(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载布吕奈尔等主编 *Précis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比较文学概论),PUF,1989,p.137。
- ⑩ 以休谟的“再现式想象”为一端,以萨特的“创造式想象”为另一端。参阅利科 *Du texte à l’action*(从文本到行动),Seuil,1986,p.215。
- ⑪ 参阅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孟华译,载《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2期。
- ⑫ 我们可以注意到,巴柔教授经常引用罗兰·巴特和列维-斯特劳的相关论述。
- ⑬ 参阅布吕奈尔等《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张连奎译,北大出版社1989年第89页。
- ⑭ 参阅巴柔“*Recherche sur l’imagologie: de l’Histoire culturelle à la Poétique*”(形象学理论研究:从文化史到诗学),载 *Revista de Filologia Francesa*, Universidad Com-

plutense, Madrid, 1995 No 8.

- ⑮ 同注 9。此外 1998 年巴柔教授在北大比较所的讲座中再次重申是从年鉴史学派,而非哲学家保罗·利科处借鉴了这一概念。
- ⑯ 参阅莫哈,上引文,载《中国比较文学》1995 第 1 期,第 197 页。
- ⑰ 同注 9。
- ⑱ 孟华:《言说他者,言说自我-序〈中日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9 第 1 期。
- ⑲ 在巴柔的诸多论文中,我们可感觉到他并不希望完全置传统于不顾,时常在传统与革新之间踟躇不前。
- ⑳ 莫哈,上引文,载《中国比较文学》1995 第 1 期,第 193 页。
- ㉑ 参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卷 2,第 246 页,“场理论”。
- ㉒ 参阅 Pierre Bourdieu, *Les règles de l'art* (《艺术的规律》), Seuil, 1992, pp. 321—322。我在此节写作中得到了社科院外文所刘晖的帮助,她不仅慨然将布尔迪厄的原著借给我,还将书中某些关于场的论述标出页码,大大方便了 my 查阅,特此致谢。
- ㉓ 在上引书第 28 页,布尔迪厄对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做了如下阐释:“权力场是牛顿意义上真正的中心。各种社会力量,引力或斥力,都在权力场中起着作用,它们在譬如爱情和激情这样的心理动机的形式下表现出来。当福楼拜把权力场的两极如此置放的同时,他也就建立起了某种社会学实验的条件:五个年轻人……将要被抛到这个空间里去,就象要被投进一个力场中去的粒子,而其轨迹将要由场中各种力所处的关系和它们自身的惯性所决定。这一惯性一方面存在于这些粒子原初和运行轨迹本该占有的位置上,并在……一种可能的轨迹中,引导出一种延续的倾向来;另一方面,它又被纳入到了粒子所继承的资本中,这一资本帮助确定了场所规约给它们的各种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 ㉔ 巴柔教授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一文中也曾使用了“权力场”、“知识场”这些概念,但未做任何解释。见该文第 149 页。此外,巴柔还经常使用年鉴史学派倡导的“总体史”概念,不过我以为这实际上与“场”的概念有相通之处。
- ㉕ 中文稿载曹顺庆主编《迈向比较文学新阶段》,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第 371—381 页。但不知何故,此书刊出的只是我在会上的宣读稿,而非正式修订稿。大部分补充与修订内容因此均未能面世,甚憾。
- ㉖ 中文稿载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大出版社 1999。
- ㉗ 巴柔十分强调形象与心态史的密切关系(参阅上引各篇论文),我对此十分认同,而我的研究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 ㉘ 此文最终以英文发表,参阅 *The Image of Westerners in literature of China and Japan*, Ed. Hua MENG & Sukehiro HIRAKAWA, Amsterdam: Rodopi B.V., 即出。

- ②⑨ 黄兴涛等译《中国人自画像》，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原书为法文，中译本自英文转译。
- ③⑩ 黄兴涛，“一个不该被遗忘的文化人”，载《中国人自画像》，第 5 页。
- ③⑪ 参阅 Foucault de Mondion, *Quand j'étais mandarin*, Albert Savine, 1890。
- ③⑫ “自塑形象”是我在上“形象学理论与方法论”一课时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指称在下述情况下由中国作家塑造的中国形象：它们或以异国读者为接受对象、或以处于异域中的中国人为描写对象，但都具有超越国界的意义，因此可被视作一种异国形象，理应属于形象学研究的范畴。
- ③⑬ 包括我所博士生李华川、张沛、顾钧及中文系博士生郭蓁等。我曾在正式校订稿中予以鸣谢，但因选编者未刊此稿，故在此再次表示感谢。
- ③⑭ 吕西安·费弗尔：“历史与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载田汝康等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第 62 页。